

281

1827
198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革命先驱

——孙中山传

〔美〕史扶林 著



A100249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前 言

孙中山在长达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未领导过一个统一的中国。因此，其治国之才和决策能力无从考察，然而这更加使他去世后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利用政治来谋取私利。他曾为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独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奔走呼喊。虽然这些目标没有变成政策条文，但作为口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孙中山长期追求权力的失败也具有代表性。中国民族主义所受的挫折，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每一个与中国的软弱和落后有联系的人都出卖他：文人学士、官僚、军阀，特别是列强。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产，吸引了为不同的政治目的所驱使的许多人。这些人包括共产党、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好”军阀，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侵略者。今天，大陆和台湾都竞相引用孙中山的话，以使各自对孙中山的评价永世长存；而苏联则曾经在对北京的指责中，称孙中山是寻求“同苏联友好”的“中国真正的国际主义者”。^①

研究孙中山“真正的”学说是不会有太大价值的，因为他

^① 德鲁森《孙中山》[31]，第19页。作者和书的全名见第320—342页的书目。脚注只引简称，括号中的数字即书目中编排的数字，如[31]指书目中的第[31]条。

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即兴诗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我们承认是由于他的政治风度，而不是由于他的思想使他与众不同时，这并不贬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个人的英雄行为。

他的临时凑合的策略，是对那些前所未有的政治问题、对那些由于外国侵略及国内腐朽制度所产生的危机的实事求是的反应；这些都要求紧急的解决办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的行为的人类和社会学意义。他见机行事的独特方式，既反映了他的社会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性格。他是非常乐观的，充满自信，而且具有行动的胆量，这是革命精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因此才能跟上中国历史的步伐。同时代比他更有才干的人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后便一蹶不振，而孙中山总是屡败屡战，准备适应新的局面。

然而，孙中山的社会经历却有碍于他争取领导权。他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农民，一个局外人，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名流们对他的偏见，他试图通过请求外国的支持来弥补这种毫无社会地位的缺陷。他生活在外国干涉中国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时代，但他倾向外国绝非权宜之计。他真诚地坚信，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

争取中国知识界的赞同和得到外国的支持，是孙中山的实用主义努力的两个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孙中山常常采取妥协和运用策略，现在看来这是同他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力量相矛盾的。使他处于一种谦卑，甚至受辱的境地。当时，孙中山有两副面孔：软弱的追求者和自负的操纵者。追求者不得不谋求妥协；操纵者则相信他可以使妥协转过来对他有利。

在对孙中山一生经历的头十年（一八九四——一九〇五），

这两副面孔是十分明显的。其背景是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它衰落的最末时期。那些寡头统治者政治上已经破产，不起作用；学者名流已变得优柔寡断和四分五裂；农民群众也变得更难以控制。传统的集团——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知识界和农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察觉了危机，但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实质上都受到传统的限制。清廷企图利用传统的势力以恢复王朝的权力和威信。进步的知识界试图把革新和儒家学说调和起来，但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制度上的改革会危及他们整个集团的特权。而农民，他们是反满的，他们希望明朝的复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仁慈的、理想的儒教国家。

然而，西方的渗透却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契机，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对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他们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这样，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面赞赏欧洲的制度，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是一种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

孙中山就是这些新的边缘集团的产物。他在夏威夷的华侨中间长大，在这个群岛和广州、香港的外国学校读书。他的哥哥是个有成就的海外创业者，而孙中山本人是个基督教徒和新

式医生。当儒家集团对他的才干不感兴趣之后，他就作为一个革命者转向这些边缘集团了。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农民出身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建立了密谋团体兴中会。它以香港为基地，由香港和夏威夷的华侨提供资金，它的最近的目标是发动会党和农民土匪反对广州政府。

但是，这并非典型的农民造反。兴中会的政治目标并不像会党的头目们所解释的那样，由儒家的思想所规定。兴中会的领导者们，想要他们的国家也有他们在外国的学校、团体中遵守的那种制度。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而不是那些仅仅通过翻译了解西方的士大夫，才最具备拯救中国的条件。尽管他们也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危险，但他们认为，一个效法欧洲的中国将会是强大的和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列强的商业利益和宗教利益。这个更大的终极目标——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政府——仅仅为极少数领导人所持有，而且解释得也相当模糊。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注重行动的密谋集团，它仅仅利用而不是组织心怀不满的农民——这个同中国的官僚主义帝国一样古老的武器。因此，兴中会是个混血儿。它受下层阶级传统的叛逆思想的哺育，又为少数倾向西方、对抗社会贤达的人的政治抱负服务。

尽管孙中山最初不是兴中会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兴中会的做法大都反映了他的风格和倾向。他熟悉农民，童年时候就被太平天国英雄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夏威夷是他的一个现成的海外基地，这里有他的许多亲戚和同乡。他在香港、澳门和广州度过了好几年，甚至在上海也有一些熟人。所有这些城市都是孕育欧化和半欧化过激分子的地方。他和当地传教士及牧师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是达官贵人不好惹的对手，是和列强联系的内在环节。

然而，孙中山所代表的这些阶层集团，无论从社会结构还

是从地理上看，确实都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太慢，还没有产生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因此，要在中国权力结构的内外确立革命的立足点，灵活性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认为，延缓中国的变革会招致灾难，因此他优先选择可以立竿见影的灵活策略。原则问题是次要的。他总是认为，他可以适当地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爱国目的。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以其天生的密谋才能为兴中会口授了一个革命方案。密谋失败后，孙中山成了被通缉的流亡者。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或船票。要不是清政府在一八九六年异想天开企图把他从伦敦绑架回国，那么孙中山注定要从此销声匿迹了。

一八九六年，孙中山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君权的敌人满怀信心地回到东方。现在，由于是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他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才能。尽管他选择日本作为避难所纯属偶然的，但形势却把这里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繁荣的中心，而孙中山则处于有利的地位。首先，日本的泛亚民族主义者正在寻找一个代理人来帮助他们实现由日本人指导的拯救中国的计划。孙中山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人选，并且获得了日本人的热情支持和合作。一年后，康有为的改良运动遭到失败，几个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也在日本政治避难。这给了孙中山一个重新谋求同绅士们合作的机会。他通过日本人的帮助，同梁启超这个有影响的改良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当孙中山分化改良派快要成功的时候，梁启超恢复了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忠诚。结果是梁启超多少遭受到一些知识界——甚至身为激进改良派的知识界对坚持西方化的崛起者的那种蔑视，后者对真正的儒家学说是大不懂的。

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给孙中山的实用主义提

供了一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考验，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同列强的战争的机会，以巧妙的对策作出了回答。他多方尝试与官绅联合，甚至期望李鸿章成为一个未来的同盟者。失败以后，他就试图以和外国结盟来作为补偿。但到后来，就连日本政府也决定不和它本国那些拥护孙中山的冒险者有来往。与此同时，密谋集团中积极的一部分则顺着它本身的势头继续进行下去。孙中山的代理人撒在广东农村的火星，在惠州引起了一场较大的武装起义烈火。这次起义显示了革命的潜力，尽管孙中山的计划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名声却提高了。

惠州起义也显示了老办法的局限性。它说明，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兴中会也缺乏冲劲和持久力来使革命得到成功。很明显，孙中山的海外支持者，这时主要仅限于夏威夷不大的华侨团体，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多只能起一种辅助性的革命银行家的作用。对香港的商人也可以这么说，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孙中山的经费问题，但他们确实是革命的最大的投资者。在领导人这一层中，广东和香港的欧化及半欧化的中国人数量太少，不能在政治变乱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一个边缘集团，同本土革命力量潜在的源泉离得太远。通过会党和匪帮从这个集团间接招募的人员组成的队伍是靠不住的。这正如我们从现代的中国历史所知道的，要使农民变成政治上自觉而有纪律的革命者，就需要由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去直接动员他们。

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些在国内回避他的知识分子威胁说要在国外干掉他。由于流亡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用一种与孙中山相似的调子进行宣传，结果他们就顺利地侵入了孙中山的财政基地。作为皇帝的声名赫赫的臣仆，他们答应同海外的商人分享皇帝的恩惠。华侨这么容易受他们的诱惑，表明了皇帝——这个传统势

力的象征的力量依然强大无比。虽然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外围发芽生长，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自立。甚至会党的战士也不免受改良派的金钱收买。

正当孙中山在日本准备应付这种威胁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却成了革命活动的潜在力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成百成千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其中许多人还享受官费。许多具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被民族主义所唤醒，加上通过日本的渠道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便背弃了原来选派他们出国的独尊儒术的官员。许多人对康有为、梁启超所鼓吹的保皇的改良主义表示开始怀疑。这些人出自名门世家，差不多中国各省都有，这个集团的出现就为革命准备好一个通常的前提：一批对统治当局不满的知识界优秀人物。

孙中山的政治命运，取决于他和这些优秀人物的关系的调整。这些学生同他原来的追随者相比都是精于政治的人。他们是更富于进取心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原因是他们更加懂得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优越感更加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中国内地感受到的外国的存在也不很习惯，甚至难以忍受。由于他们的社会出身大都是官宦之门，所以他们仍然很看重知识分子的才能，如果不是在实质上，也是在形式上和作风上。这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领袖必须为自己证明在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

最初，孙中山被认为是一个粗野的阴谋家，从此他逐渐改善了自己在这个新的学生圈子里的形象。事实上，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孙中山的政治品格业已走向成熟。他的多次旅行，他在伦敦从事的研究，特别是同日本知识分子和中国流亡者富于启发性的接触，都丰富了他的思想。在政治眼光和对革命承担义务方面，他都远远地超过了他在兴中会中的支持者。现在，从有限的社会圈子解放出来之后，孙中山显示了他那超凡的适

应能力。他发挥了演讲的才能，正确运用民族主义的含义，表明他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最新潮流很熟悉。到一九〇五年，他就能够组成一个以海外学生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组织。这是他的重大突破，是他在政治上自有抱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机会。经过在外国十年的活动，呕心沥血，他现在终于能够进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了。

同盟会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从组织上说，它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从地理上说，它把革命活动的支撑点，从各个通商口岸和海外团体转移到中国内陆地区，在那里，从海外回来的学生将扮演革命煽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和广东人占压倒多数的兴中会相比，这个新组织赢得了众多省份和民族的支持。同时它又是多阶级的，它把知识分子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同农民的骚乱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使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中国的政治有了发言权。更为重要的是，同盟会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清政府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缝有了真正的意义。这些学生在信奉儒教的领导者之外挑选了自己的领袖，表明他们对儒教信仰的背叛。

这就是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取得成就的历史意义。他是中国第一个非仕宦出身的政治运动领袖。

目 录

前 言	(1)
一 孙中山：早期的影响	(1)
二 兴中会的建立	(21)
三 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	(31)
四 伦敦蒙难	(59)
五 东京，对大陆的重新渗透	(90)
六 李鸿章、卜力与何启	(119)
七 惠州起义	(142)
八 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	(167)
九 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	(184)
十 孙中山：一个新的转折	(196)
十一 建立同盟会	(229)

一 孙中山：早期的影响

因为广东省的香山县靠近香港和澳门这两处欧洲人在东亚最早的殖民地，故最早介绍西方社会的中国人大都出自这里。在这些中最著名的是孙中山，后来这个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中山县。孙中山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翠亨村，名文，字帝象。

翠亨村约有一百户人家，主要从事农业和捕鱼。由于这里山多石多，田地少，一些男人便到附近的城市澳门和广州做工以资补贴，还有一些人则经商。因此翠亨村并非与世隔绝的村庄；甚至有的富有的城镇居民也在这里盖了别墅。和广东、福建沿海的其他乡村一样，翠亨村也有很多人到东南亚和西方侨居，与这些侨民接触，有助于开阔村民的视野，使他们产生希望。

对孙中山的家庭来说，移居国外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原来赤贫如洗，父亲孙达成只有一点土地，不得不靠务农、当小贩和在澳门做裁缝为生。孙文出生以后，孙达成在村里又找到更夫的工作。此时他已五十四岁了，家境非常惨淡。五年后，他明知移居国外有种种危险，但他还是决定让长子孙眉跟随他的舅舅到夏威夷去，他的舅舅在那儿经商。孙眉虽然精力充沛，但是浮躁好动、喜欢玩乐的人，据说他父亲乐于让他离开。

夏威夷给孙眉的冒险精神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在此期间，夏威夷正流行种植中国水稻，他起初作为农业劳动者受雇

于别的香山侨民。后来他在舅舅的帮助下，与人合伙建立农场，并在檀香山开了一间店铺。从此财源不断。孙眉对于自己辉煌成就的叙述，对于这个群岛的富庶和自由主义政府的描写，深深地吸引了孙文，使孙文产生了想到他那里去的念头。

一八七八年，成了家庭的恩人和村子里的英雄的孙眉荣归故里，父亲要给他完婚。十二岁的孙文希望跟他的哥哥一同回去，但是他不得不等到第二年他母亲到檀香山探望他哥哥时，才把他带去并把他交给孙眉照料。

孙中山在村里只受了启蒙教育。虽然他读过传统的启蒙课本，接着读过四书五经，但由于家境贫寒影响了他的正规学校教育，所以对经典缺乏全面的修养。他受系统的教育是在夏威夷开始的。因为此时夏威夷群岛还没有华人学校，要上学只有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去。即使是这些学校，中国孩子也不大去。但是孙眉决心让他的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希望他能超过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就。孙文在孙眉的店铺里帮助做点事，通晓了珠算和簿记，但他对这种工作非常厌烦。他后来进了意奥兰尼书院，它是英国人在檀香山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招收夏威夷孩子和夏威夷混血儿，也招收数量有限的中国孩子。

把孙中山安置在学校里，证明是对的。因为在短短几年中——至一八八一或一八八二年——孙眉就积累了足够的资本，着手一项更为伟大的计划。他向夏威夷政府租了茂宜岛的土地，自己进行垦殖牧畜，并在茄荷蕾设一商肆，专销农牧产品。他的慷慨大方及领导能力，博得当地岛民的尊敬，他们称他“茂宜王”。

孙眉到茂宜后，使家庭富裕起来，但也使他的弟弟更倾心于外国的影响，在学校里，他就置身在这种影响之中。

尽管夏威夷当时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但在英国圣公会教士韦礼士主教主持下的意奥兰尼书院却是反美和反吞并主义情

绪的地方。这个学校的教师除一位是夏威夷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教课全用英语。结果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和西方制度的第一次品尝，那味道明显是英国风味的。实际上对于孙中山后来拥护共和主义，这位主教不但没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相反，他后来极力否认孙中山在意奥兰尼书院期间，他曾传给孙中山一个“以策划阴谋反对地方当局的传统”。

尽管主教不承认，但是，如果说孙中山这时耳濡目染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立宪政府观念，是英国人民长期反对专制势力的斗争故事，那么，他在这个易受影响的时期留在意奥兰尼，对他后来致力于国内革命并非没有联系。因为意奥兰尼书院支持夏威夷的独立事业，抨击亲美的吞并主义者的图谋，因此，它也许应对孙中山后来产生亚洲人必须抵抗西方侵略的政治观念负责。

孙中山同基督教徒的交往（这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始于意奥兰尼书院。韦礼士主教（他讲授基督教义课）后来暗示，孙中山如果不是他的“异教亲属”的反对，就已经受洗了。这位主教热切希望看到七个中国寄宿生成成为基督教徒，为此请了一位年轻的中国福音传教士每天下午给他们讲授经文。这些年轻人威胁说，如果讲授宗教，他们就要抵制这门课，并强迫那位福音传教士给他们讲中国历史，这时主教宣称，假如他们不愿听福音，他不会强迫他们。但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全体寄宿生，每个星期日都必须到圣安德勒大教堂去做礼拜，慢慢地，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便被吸引到基督教里去了。

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意奥兰尼书院学到了西方的知识。刚入学时，他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三年后在毕业典礼上，他的英语语法获得了二等奖；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亲自授奖。此外，意奥兰尼使他想得到更多的西方教育——比帮助他

哥哥的事业所需要的还要多。

因此，又在哥哥的店铺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孙中山进了当时该群岛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即泮拿荷学校）。这所美国公理会学校设在奥阿厚（离檀香山两英里）的泮拿荷，在这里上学的学生都是同夏威夷福音会（公理会教友和长老会教徒）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子女。孙中山在奥阿厚对政治学和医学都有兴趣，甚至想到美国去继续深造。他在这个环境里对基督教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但是孙中山对外国宗教的这种感情，使他在夏威夷的教育意外地结束了。原因是孙眉对弟弟的进步本来高兴，甚至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登记在弟弟的名下，但是他并非为了让他的弟弟同中国的传统疏远而资助他受教育的。虽然孙眉从来没有显示过他有什么学者的才能，但是在学问和宗教问题上他却忠于传统的观念。在夏威夷的中国人中间，宗教问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并已经使他们的团体发生分裂；孙眉参加了保守的一派。一八八三年，当孙文行将皈依基督教时，愤怒的孙眉便将他送回翠亨村，不让他再回来了。

孙中山在国内的行为，证实了他哥哥的忧虑。他在夏威夷所受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教育，同农民的习俗和信仰发生了矛盾。不久，他和他的朋友陆皓东因为故意亵渎当地的木偶神像，震惊了他们的家庭和整个村子。因此，这两个偶像破坏者被驱逐出村。在此之前，孙中山就因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出了名；他热情地谈论太平天国——儿童时代村里传颂的英雄，谈论拿破仑和华盛顿这些在夏威夷课本中读到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

从偏僻的乡间生活逃出来并继续求学对于孙中山来说是他所高兴的。他前往香港，进入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拔萃书室。与此同时，他开始跟基督教伦敦传道会会长区凤墀研究经

史之学。这也许是对家庭的一个让步，或许是为了满足个人进一步学习中文的愿望。一八八四年四月，孙中山转入皇仁书院，这是一所著名的中等学校，就读的都是各国中产阶级的孩子。孙中山的父亲由于性格仁慈，可能给了他经济上的支持。

现在，孙中山决定正式加入基督教。一八八四年，他由刚到中国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施行了洗礼。同时受洗的还有孙中山的朋友陆皓东，陆后来成了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孙中山对喜嘉理和其他两位基督教牧师区凤墀、王煜初都有极为深厚的感情。施洗礼后，区牧师为孙中山起了个新名字：逸仙，这是日新的广州读音。

但孙中山尊重中国的传统，他仍然是个孝顺的儿子。一八八四（或一八八五）年五月七日，他回到翠亨村完婚，这是他父亲早已为他订下的。新娘卢慕贞（一八六七——一九五二）是一个商人的女儿，婚后她仍留在村里，孙中山则回香港求学去了。

有关孙中山在国内的恶劣行为的消息在此期间传到孙眉耳里，这位哥哥对基督教的反感（孙中山的一位知己形容它是“荒谬的”）并未稍减，命孙中山回夏威夷去。这是两年里孙中山第一次接到哥哥的信，因此他顺从地返回茄荷蕾。但是，如果孙中山希望和解的话，他的哥哥却不会这样。孙眉要他交还先前给他的财产，据说还叫他“出去靠自己卖力为生”。另一个传说则说，孙眉希望要他在店里工作，学做生意，以洗涤他的异端思想。

不管具体细节如何，这是孙中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他并不气馁，他前去檀香山找他的基督教朋友寻求帮助。他在意奥兰尼的同学钟工宇那里暂时寄住，拜见了夏威夷布道会会讲广州话的业师芙兰谛文。当谛文牧师知道孙中山希望回国继续深造时，便为他向朋友们筹募了必需的三百美元，捐赠

者中有一些是有势力的美国企业家。钟工字也把他一个月的薪金五元钱捐献出来，还让孙中山在他的裁缝店里任意选用他所需的衣物。这样，在一八八六年春，孙中山穿着新衣服带了很少的钱回到中国。

孙眉终于认识到他的弟弟决心要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就决定恢复关系，通过由他父亲转交汇款的办法恢复对弟弟的资助。一八八八年父亲去世时，兄弟俩已完全和好了。此后，孙眉的忠实支持在孙中山的生涯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资助了孙中山的职业训练，最早促进了他革命的政治活动。孙中山的基督教徒同胞和西方朋友——曾引起孙眉怀疑的传教士和老师——则提供其他的帮助。在后来孙中山走投无路时，他还要多次地向这些人求助。

孙中山在皇仁书院读了两年半之后（在这里他没有得到毕业文凭），想选择陆军或海军为职业，这或许是受到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的影响。可是少数几所现代学校不欢迎农村小伙子，而其中最著名的福州水师学堂则在战争期间被法国人破坏了。另一个可能的职业是法律，这同样无法做到，唯一可供选择的就学医了，这是他早年在夏威夷时曾经感到兴趣的。一八八六年，喜嘉理博士介绍他进入广州博济医校就读，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嘉约翰博士主持的英美教会合办的学校。

在开始学医的时候，孙中山更加认识到中国在政治上的困境。他自己回忆说，早在一八八四年他就下定决心为推翻清王朝而奋斗。中国船坞工人于中法战争期间拒不修理从台湾开到香港的损坏了的法国船只，他对中国工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非常感动。他把他们的抵抗与清政府放弃中国在安南的权益作对比。但是，如果他早有志于此，那么是什么原因又使他在——一八八六年开始学医呢？孙中山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想“以

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的确，孙中山的家庭出身限制了他所能影响的范围，而现代专业人员的身份也许可以增加他在显贵人物中的地位。但是，很难接受他三十年后的这种说法，即学医是他走向革命的深入思考的一步，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为自己民族的处境忧虑，但他的决定却表明他还不知道如何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在这个过渡阶段，职业上的雄心和政治上的抱负一直变化不定。

一个在医校新结识的人，他的同学郑士良和他一样具有强烈的反满情绪，这个人注定要在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郑士良是广东客家人，对当地的绿林好汉和遍布华南的会党三合会很感兴趣。尽管他文才出众，却进了广州一所德国教会学校，他在那里受了洗礼，然后到医校就读。他和孙中山成了忠实的朋友。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才认识到会党中蕴藏着反满的潜力。

孙中山继续研究中国的历史，并请了一位私人教师帮助他弥补他在古典教育方面的不足。其他的学生认为孙中山摆在书架上的二十四史仅仅是装装样子而已，但孙中山有机会证明他是熟读了它们的。他对古代，特别是汉朝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这种课余爱好是孙中山不断增长的政治敏感的另一证明。

在广州一年后，孙中山决定于一八八七年转入香港为中国人创办的西医学院。他在这里可以更自由地表明他的政治见解，现在这些见解常常带有颠覆的含义，这种自由是英属领地提供的。孙中山在香港度过的五年（一八八七——一八九二），在智力的激发和个人交往方面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时期。这个书院是一所英国学校；它在东亚为医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标准。讲课用英语，大多数教师是英国人，其中一些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